

时间流动不居 艺术史变化不止

——评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

杨 肖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军作《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围绕“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这一核心问题，讨论了博物馆、艺术史、可视、图像四个问题；又围绕四个分问题，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问题群落，譬如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是艺术史，谁发明了艺术史等，在古今的视野之下，研究了空间与时间的复杂变动关系。

第一编为《收藏与展览的考古学》，尤可注意者有二。第一节分析“收藏”的观念，作者做了概念考古，考辨了收集、收藏、私人收藏、公共收藏，又研究了礼器、古物、古董、宝物、文物、珍宝、杰作、文化遗产等概念。语言是名，乃实之文化场所，“充塞其中的不是收藏物，而是哲学家的身影和哲学讨论的激辩之声”。世人皆言博物馆源起缪斯神庙，作者廓清了迷雾。第二编为《现代艺术史体制》，尤可注意的是指出了意大利艺术史家、《艺苑名人传》的作者瓦萨里的重要性，实际上作者对瓦萨里的研究与推崇贯穿了全书。

作者认为，瓦萨里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艺术史之父”，而非黑格尔或温克尔曼，因为他创立了一种艺术、艺术史与博物馆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或“现代艺术体制”。第三编《历史与空间》讨论瓦萨里艺术史模式的具体空间来源，追溯与“最后的审判”系列图像和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图像与布局的联系，追溯了与《方济各生平》祭坛画的关系。第十四章是全书精华所在，着力讨论了阿西圣方济各教堂的图像与布局。第四编《图像的物性》与前面章节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作者追溯了树形结构的历史渊源，讨论了风格树、家谱树、知识树等。篇末李军将目光“面向了东方”，初步展示了东方的树状结构，以后如若集中于树形与东方关系的考辨，或能开出崭新的学术成果。

作者不仅研究上述4个问题，更要研究博物馆、教堂、艺术史和关于艺术史的图像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在怎样的条件下相互渗透与转换等。读罢《杜尚传》，李军作诗《伟大的逃遁者》，末二句为“一只鸟鸣叫着离去，落下天空中唯一的雨。”若稍作引申，鸟者，可谓博物馆、教堂、艺术史和关于艺术史的图像之间的复杂联系；“雨”者，鸟屎谓称也，可谓只执一端不知内

在关系。鸟屎易执，因其不变，因其可控，故执之者众。鸟则难执，因行踪不定，忽飞忽止，方执之方变之，如何可执？治美术史者，执鸟乎，抑或执鸟屎乎？求古今变通，明整体情况，抑或只拘一端？这是重要的抉择。李军是欲执鸟者。其诗《三十万个太阳——五七走过雷峰塔》，可见志向与境界。“这个地方，曾经没有水塘，没有楼塔。曾经没有人，走过这个地方。曾经有三万个太阳，走过这个地方，曾经有三十万个太阳，走过这个地方……现在，独自一人，我走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水塘和楼塔？没有亦有，有亦没有。不可执一端，必也肯定曾经没有或曾经有。到底有多少人走过这个地方？一个？三个？三万个？三十万个？是亦不是，不是亦是。执着于没有这个地方或有这个地方，执着于三个或三万个，皆是逐鸟屎而非逐鸟。是亦可不是，不是亦是，方可方不可，方可方可不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此谓逐鸟，此谓研究内在复杂关系。

李军引用了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所言与艺术作品相关的三种时间：作品的当世存在、问世时代及从问世到当世的过程时代，以为应具备此三重视野，方可真正了解艺术。作者在这本书中实践了此种观看问题的方式，

讨论“可视的艺术史”，研究从教堂到博物馆的演变，明了变化中的艺术史和艺术史的变化，捉住“可视的艺术史”这只活鸟。时间流动不居，艺术史变化不止。唯有明了变化，方可见出艺术史的复杂性与变动性，见出博物馆和教堂之间的隐秘关系。

研究从教堂到博物馆的转变，确实抓住了重要问题，由此使人了解近代以来欧洲甚至世界的巨变。从教堂到博物馆的变化是象是形，固关乎艺术，然又不仅与艺术有关，其内在原因是人民地位的变化，是欧洲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教堂非自古有之，是宗教的产物。博物馆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今发展如火如荼。教堂曾是少数人垄断政治和教育的体现形式，是神的栖居地；博物馆则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形式，是民众的道场。

古代，民是被教育者，如今人民处于当家做主的地位。读罢此书，不免令人深感，时代不同，时代精神外在表现形式亦不同，虽然曰不同，又有关联。博物馆既新亦旧，既旧亦新。懂得整体，明白变化，“立足当代性视野”，方能作出如此通达的判断。

（《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

清代京官的“养廉银”

李 娜

清代“养廉银”制度实际上设立在雍正、乾隆两朝，分为外官和京官两个阶段进行。清代外官“养廉银”发放在雍正朝财政改革后，已为学者所论证明晰。清代京官“养廉银”问题则是在乾隆朝解决的，学界关注较少。

雍正即位之初，各地官吏征收钱粮火耗日渐增加，按惯例地方官向户部交纳钱粮，每一千两税银，加送余平银二十五两，饭银两钱。雍正帝推行财政改革实行耗羡归公。通过耗羡归公，清政府将原分散在各地方的耗羡收入的所有权、支配权收归国有。同时将其其中一部分拨出通过“养廉银”的方式补贴外官的私人生活或一些公务开支。此次财政改革对各级官吏来讲是变暗收为明补，革除了地方私征滥派的弊端。耗羡归公与养廉银的发放既是清代雍正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在财政上的一个表现。

外官经过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的实施解决了后顾之忧，京官的养廉问题也逐渐被提出。雍正六年(1728)开始给礼部以外的五部尚书、侍郎多发一份俸禄，称“恩俸”，但是标准远远低于外官的“养廉银”。乾隆帝即位后，体恤京官的艰辛，特意在户部余银中拨款养廉，通常以饭银的名义从地方征收并发放，如有剩余兼做办公之用。“朕临御以来，洞知京员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为悯念。以量入为出，国有常经，必须筹划周详，始可施行久远。今查得户部有平余银两，系各省与正供随解之项，每年约有十六七万金不等。此项银两，

在内外，原存贮以备公事之用者，若即以分给部院办事之人，作为养廉，于情理亦为允协。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官员之多寡。其原有饭银，已足敷用者，毋庸赏给。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来并无饭银者，酌量给与。至翰詹京堂等衙门，虽事务不繁，而淡薄较部院更甚，均当令其一体沾恩，可按数分派。”

当然京官因所在部门不同，饭银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区别。乾隆七年(1742)故刑部尚书刘吴龙遗疏内称：“在京部院衙门，皆有饭银，而户部银库养廉，尤为丰厚。惟内閣、吏部、礼部等衙门，未获一体邀恩。”

乾隆帝解决京官的“养廉银”问题最后的落实情况如何？京官“养廉银”的发放标准、时间、数额等如何？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自撰的《王文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和资料。

王际华，字秋端，号白斋，别号梦魇居士，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六日。他是乾隆十年(1745)一甲第三名进士，随授编修，三年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十四年(1749)，奉命入值南书房。后充湖北考官，擢内閣学士、礼部侍郎，辗转任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升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迁户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王文庄日记》为王际华乾隆三十五年(时为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十

一月，王际华以户部左侍郎擢为礼部尚书)。和乾隆三十九年(时为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调礼部尚书王际华为户部尚书)。所记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有手稿本，影印版收录于《历代日记丛抄》。该日记逐日记录，通常依次记录，包括时间、天气、工作、交际等情况和重要家庭事务。当然，其中还记录有每日生活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支出的情况，如“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清代官员的俸禄，清初承袭明制实行低俸制度。京官正从一品俸银180两，禄米90石，依照品级而递减。王际华当时除俸禄之外的主要收入是饭银。饭银，是清代京官俸禄之外的补贴，各部之间并不一致，名目也有区别。王际华日记中出现了各种“饭银”的记载，如“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十二两。”“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以上各种“饭银”，名目多样。铜批银，也称为铜批饭银，是“饭银”的一种，时间较为固定，基本每两个月记录一次，全年共6次，每次二百余两，总计约一千三百两。其余的饭银总计约七千六百两，其中以头卯、二卯等饭银为最多。头卯、二卯、三卯等饭银，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就是因当差而发放的津贴。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两，这些“饭银”即是以不同名目发放的“养廉银”。王际华收到的各种补贴

收入数额远远高于自身品级所应得的俸禄。除饭银外，京官还会有一些地方官员孝敬以及其他的灰色收入。应该说，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要职，所得待遇比其他京官更加丰厚、优渥。

《王文庄日记》中所记录的经济资料比较真实可信，尤其是日记私密性使其中记录的数据很真实、鲜活和具体，同时弥补了正史中有关京官“养廉银”资料的匮乏，并且可以让我们们在一位户部尚书整年家庭经济情况的背景下考察“养廉银”的数额和作用。王际华每年饭银大约在万两左右，这与经过规范过的外官“养廉银”大体相当，足以让其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养廉银”是其家庭基本生活消费之外进行社会应酬和经济往来的强大经济后盾，这与雍正帝进行财政改革设立“养廉银”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补贴官员的俸禄不足的初衷是契合的。

《王文庄日记》对清代京官“养廉银”进行了印证，京官“养廉银”从乾隆元年的“酌量加添”“酌量给予”到后来逐步形成惯例。从这些真实的、具体的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雍正帝和乾隆帝在财政改革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轨迹。

作者简介

李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助理，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史、经济史。

葛亮长篇小说《北鸢》首发

本报讯 近日，《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香港作家葛亮历时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北鸢》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青年作家蒋方舟、著名学者止庵及编剧史航就小说中的“民国书写”展开讨论。

该书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小说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葛亮以家族故事为引，描写了军阀、名人、知识分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令读者感受到了动荡时代下人们情感的分量。

评论界认为，该小说勾勒了政客、军阀、文人等上百位民国人物，内容涉猎政经地理、城郭样貌、书画烹调、服饰曲艺，不啻为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陆云红）

《元西域人华化考》

本书是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著作，它从文学、儒学、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当时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全书资料丰富、考证精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代经典。书前收入陈垣之孙陈智超教授撰写的“导读”，说明了该书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国际影响、版本流变等情况。

（陈垣 著 中华书局2016年9月出版）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本书作者魏根深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家。作者曾凭本书获得国际汉学界久负盛名的儒莲奖。本书编写初衷是为西方学界提供有关中国研究各个领域的概况与资料，历经40多年的扩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这部篇幅达290余万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本书收录1万余种中外文资料，其中大量外文资料，从目录学角度看，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中西比较的视野也给予国人很多启发。

（【英】魏根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

今年88岁的孔庆普先生，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参加了北京城墙、城楼的拆除工作，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消逝。在这本回忆录中，他一方面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另一方面记录北京城古建筑损毁、修缮与维护的往事，其中关于那些城墙、城门、古桥、牌楼、门楼的技术资料，以及反映那些古建筑风貌的老照片，都弥足珍贵。

（孔庆普 著 东方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林纾家书》

林纾(1852—1924)，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本书分为两部分：其一为林纾训子家书，共104通，信中林纾向子辈传授处世之道，可见传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透露出社会新变于传统家庭的冲击；其二为经林纾批阅的四子林琼的作文13篇，展示了林纾教读古文的方法及评判标准，可感其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殷殷期许。书中所收书信、作文多为首次整理，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参与编辑校注，并称其为“所编书中费力最多的一册”。

（林纾 著 夏晓虹 包立民 编注 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出版）

《烟河》

这是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计划的三部曲小说中的第二部，所写的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鸦片战争，不过是从印度的视角——因为鸦片贸易，恒河岸边茂盛繁密的罂粟花田和广东人头攒动的后街小巷似乎紧紧相连。上一部《罂粟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印度，《烟河》中，小说人物则陆续来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广东，继续演出他们的爱恨情仇。除曲折的故事之外，书中还有学者型作家高希对殖民主义历史的深刻反思。

（【印度】阿米塔夫·高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往来于故土之间》

托马斯·林奇是获美国图书奖的《殡葬人手记》一书的作者，他透过殡葬业来讲述一座美国小镇的生死更迭与世事变迁，也折射出现代人的迷惘与缺失。这一切都来源于他20多岁接手家族在密歇根州小镇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开始的殡仪员生涯。此外，他还任教于韦恩州立大学殡葬系，著有诸多诗作和散文，并于上世纪70年代初起，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30多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的历史与故事，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写就了这部半回忆录、半似文化研究的《往来于故土之间》。

（【美】托马斯·林奇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出版）

